

书画作品
张云徽

流年水华

— 张云徽从艺 50 年

UNFORGETTABLE YEAR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流水年华：张云薇从艺 50 年 / 张云薇著. - 北京：
外文出版社，2005.10

ISBN 7-119-04275-0

I. 流... II. 张... III. 张云薇－生平事迹
IV.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5952 号

流水年华

责任编辑：张云薇 蔡 荣

装帧设计：蔡 荣

© 2005 外文出版社

出版发行：外文出版社（中国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）

邮政编码 100037 <http://www.flp.com.cn>

制 版：外文出版社照排中心

印 制：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9 × 1193 24 开 (精) 印张：6.5
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(汉)

ISBN 7-119-04275-0

定价：10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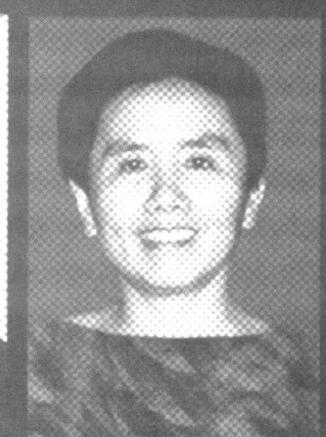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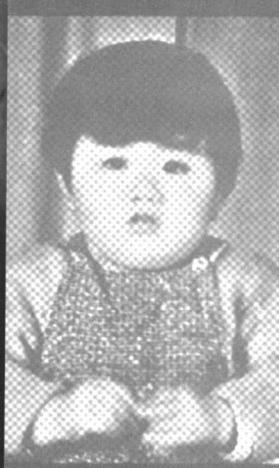
张云徽

华年流逝

— 张云徽从艺 50 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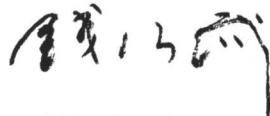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



云薇老友要出集子，要我写几句话。我一直很喜欢她的作品，喜欢她那种诚恳坦率的性格，她的诚恳坦率几乎近于一种童心和天真，而正是这种“天趣”，使她的作品都具有可爱的魅力。她很大胆，决不保守，她的真诚使她免除了名誉地位的负担，使她勇于探索永不满足。有时甚至有点怪异。但因为她天真，对世界充满了真诚的爱，所以她的“怪”并不使人讨厌。都有它的可爱之处。正因如此，她的作品很受人欢迎，她经常得奖。但我认为她真正的优点不完全是多种多样的探索和尝试，更重要、更本质的却是她万变不离其宗的真挚爱心，一份永远真诚的童心。让这一份赤子之心永远引导着她奋进吧！



2005年9月5日



欣闻张云薇从艺已达五十年，朋友们都想藉此之际对她祝贺一番。又闻张云薇亦在编著从艺五十周年的画册，其中有作品、有照片、也有文章。既回顾了她在学生时代朝气蓬勃的生活、和老师、同学之间共求进步的欢乐情趣；也记载了她走上工作岗位，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和人民教师的艰辛而漫长的历程，和在同事之间、师生之间共创事业的甘苦回忆。我想这将是一本十分别致而精彩的画册。

张云薇想把我2000年为她的“同行”展所写的一篇短文编选进来，我颇感荣幸。正好就此对张云薇从艺五十周年致以热烈的祝贺。乍听起来，从艺五十周年了，定然是位老人，其实刚过花甲不多年的张云薇，无论从身体状况还是精神状态来看，都还是年富力强。当今的时代都说七十不稀，八十不老，我们祝愿六十多岁的青年张云薇在艺术上不断取得新成就，作出新贡献。

丁巳
九月

2005年9月3日

一个教师的教学价值和师生互教互学

张云薇是1965年浙江美术学院(现名为中国美术学院)雕塑系的毕业生。当时北京市向浙江美术学院雕塑系要调一名毕业生，她以优秀的成绩被推选分配到北京。但是，出人意料的是北京市所要的“雕塑”人才是做玩具造型的。但她仍以自觉的责任心，尽职尽业的精神，努力去做好工作，这一下去就是十几年。1979年她幸运地调到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担任教学工作，这无疑是她事业发展的重大转机。但是，她也遇到了新的挑战。她在浙江美术学院学的是通常称之为纯艺术的雕塑，而这里则是工艺美术性质的学校，她必须首先要学工艺美术方面的知识和技巧，必须要把纯艺术的雕塑和工艺装饰雕塑溶合起来，才能胜任工艺美术学校所赋予她的教学任务。她在这块新土壤上学习、探索、辛劳地耕耘着，这一去又是多少年过去了。

有一个现象，逐渐的显现出来。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自1982年起，每年招收新生时，都有来自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的学生来报考，考试的成绩很好，录取率很高。入大学后，他们一般都学习进步很快，大学毕业时，也多以获得优秀的成绩。这就引起我们对工艺美术学校的关注。这些到美术学院来深造的，或毕业于工艺美术学校，直接到社会上从事雕塑工作的人中，很多是受教于张云薇老师，

张云薇是他们在雕塑艺术上的启蒙老师。当然，一个学生的整体素质是受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，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教学方针、教学方法，众多教职工的辛勤劳动都是重要的、基本的因素，然而，作为雕塑专业，张云薇老师的教学是卓越的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扬。

生活中流传一个富有寓言意义的“三个馒头”的小故事，说的是：有一个人肚子饿了，买了一个馒头吃，没吃饱，又买了一个吃，还不觉饱，就再买一个吃，这下吃饱了，他大加称赞这第三个馒头如何之好，后悔当初没就买这个吃。殊不知如若没有前两个馒头垫底，这第三个馒头怎么能一吃就饱了哩！我们应该记住，并感谢在我们成长中各个阶段的，曾经扶植过我们的人。大学的、中学的、小学的、直至幼儿园的老师、阿姨们。作为一个教师，又身兼艺术家的人，除自己在艺术上的不断推进之外，最大的愉快和欣慰莫过于看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涌现。

在当今和未来的发展中，师生之间，同学之间的互为推动的力量，是一种美好而热情的力量。我祝愿他们在这强大的互动中，获得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就。

目 录

岁月追踪 7

瞬间留住永恒 53

敏于思 勤于手 67

从艺步履 151

岁岁
月月
追追
踪踪

我从进入美院附中，到美院毕业是十年，以后搞玩具设计又是十年，当教师，迎来新同学，送走老同学，从教30年。不知不觉就老了，成为退休职工。真是时光如流水，掐指一算，从艺整整50个年头了。

干了快一辈子的美术工作，做了几十年的教师，出一本集子，已不是想扩大影响、成“名”成“家”。只是想自己编一本册子，收入一些自己觉得还有意思的，不管它成熟不成熟的作品。还有我的回忆，记述我周围的一些老师、老同学、老朋友，新朋友和学生们，让他们也让我自己闲暇时能翻翻、

看看，回忆回忆，遐想遐想，交流交流，甚至还能情不自禁地笑上一笑：“就是她，就是她！”这不是挺有意思吗？

这本集子既小，又没有什么惊人之作，但可以看到我眷恋事业、感激恩师、思念同窗、惦记朋友和关心学生的一颗诚心。

“人生如梦”，固无所求，但无所求不是无可为。改革开放以来，我们这一代不仅受到艺术观念的冲击，也感到知识老化的压力，但我还是要“学到老”，向中外古今学，向同行们学，向学生们学，在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道路上不断进行实践和探索。

父母之恩

我1940年出生在上海，籍贯是江苏常州武进。



出生40天

我的父亲张志勤，学徒出身。解放前，曾营救、资助过奔往延安的朋友。1949年上海解放时，他已从新华银行一个普通办事员提升为第三办事处主任(襄理)。1951年他响应人民政府“支援北方建设”的号召，主动放弃在上海的优越生活和可观的薪水(从200多元减为80多元)，只身北上被分配在北京第一机械工业部财务部门，任一名普通的办事员。他为人乐观、豁达，喜欢古诗词，喜爱京剧，能写会唱，业务能力也很强。我小时候很佩服他能双手打算盘。可他就是说话不知遮拦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。不久被“发配”到山西大同一个小县的煤矿做财务工作。戴着“右派”这顶帽子蒙冤受屈地过日子的心情，不用说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像，就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由于当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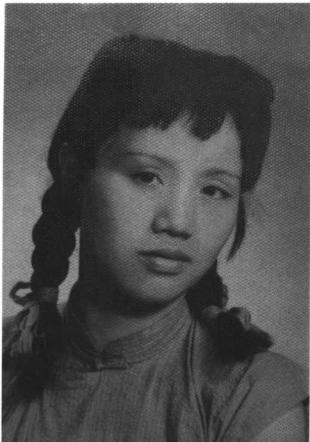
年龄小，也很少对爸爸表示过安慰和关心。很难想像他只身一人被“流放”到边远地区那个穷山沟里的煤矿上达廿多载是怎么过来的，虽说“右派”的帽子最终被摘除，可人已到风烛残年、身心俱衰了。有谁去认真体味过他老人家那颗苦涩的心呢。他离休后才回常州和我母亲过上“团聚”的日子。“四人帮”被打倒，乡亲们奔走相告，他听到了十分激动，历数了四人帮江青、张春桥之流的不少罪行。由于兴奋过度，当天晚上，患了脑溢血，身体就更虚弱了，1983年去世。

我的母亲王璧如，常州奔牛人，年青时，读过



一周岁

蚕桑学校，当时也是个开放女性，结婚成亲时，不肯坐花轿，自己骑自行车到婆家，曾在乡间传为美谈。婚后，正值抗日战争艰难时期，颠沛流离，生活极不安定，就再也没有参加工作。她养儿育女，相夫教子。“反右”



父亲母亲



1956 年全家合影

后我父亲工资又降为 60 多元，她一人给别人洗衣服，做衣服，打毛衣，用瘦弱的双肩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。她也是个乐观、豁达的人；更具有坚韧不拔、吃苦耐劳的精神。她的手极巧，无论剪裁衣服、编织毛衣，还是烹饪，都是行家里手，家里孩子的

吃穿都由她一手料理。在那最艰苦的日子里，我们儿女总是看到一个快乐欢笑的妈妈。家庭充满温馨，我们五个儿女一直相处得和睦、融洽。好不容易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，她又为我们照看下一代。在儿女们为她 90 岁祝寿时，大家一致评她为我们全家的



与弟妹马燮珠在妈妈 90 岁寿宴上

第一大功臣。当她弥留之际，拿出多张写着儿女们名字的银行存折，原来她把我们平日孝敬她的钱，舍不得用，全替我们存入了银行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最近见到播放的“我的父亲母亲”的电视栏目，上镜头的大都是名人或名人的父母，可我想还有许多和我的父母亲一样，他们虽是默默无闻的平常人，但他们在我心里一样是伟大，可敬，可亲的父亲、母亲。

无忧童年

小时候，常常梦见自己会在天空中任意遨游，俯瞰天地是那样美丽。其它的梦就飘得不知去向了，但这留下的梦在我心里永远是温暖和快乐的。我从小记事起就住在上海江苏路754



十岁

弄8号。解放前，在就近的真光小学就读。它是一座外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小学。校长是一位戴着金丝边眼镜，穿着西装，很慈祥的白发瘦弱老人，说话声音也是轻轻细细的。可师母很严厉，记忆中她总是穿一身黑衣服，我几乎没有见她有过笑容。每星期六由她带着学生做祷告、唱赞美诗，她还教学生英语，上课时，桌上总放着一把厚厚的戒尺，用它打过不少学生的手心，我很怕她。记得一次英语考试，我完成后将试卷交到她面前，她让我留下，马上批改我的试卷，若不及格，就要打手心的，我战战兢兢地等待着，幸好那次总算通过。但我还是受

到过班主任兼教语文的李老师的处罚，被打过一次手心。她当时约卅多岁，高个儿、高颧骨、黑皮肤，脸上化很浓的妆，黑眉眼，血红的大嘴，穿戴总是很齐整。平时我的学习不错，还听话，所以她对我也挺好，一碰到学校要表演节目，总让我上台朗诵《三只羊》：“……小羊走过桥，噔、噔、噔；大灰狼说：我要吃掉你！小羊轻声地哀求：我太小了，请你别吃我……”那时候，我爱在马路边的小书摊上看小人书，一分钱看一本，有时候摊主还优待，可看两本。《三国志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小王先生》(当时可不知是叶浅予先生画的)等，我总是看了再看。但学校是不让学生坐在马路摊边看的，那是“野孩子”才干的事。我虽躲在角落里看，可是，有一次还是被李老师发现了。处罚就是打了三下手心，又痛又



与同学鱼梦玲在礼堂表演



父亲与孩子们

麻，我哭了。父亲并没有责怪我，倒是以后让我将书租回家来(虽然租金要贵一倍)，全家都能看。他还能有声有色地给我们讲《三国志》段子。有一次，他已说了“且听下回分解”，准备去上厕所，我和弟弟们还不罢休，也跟着他到厕所，他只得坐在马桶上继续给我们这些忠实的听众讲述。

解放前夕，真光小学关闭了。当时转小学也是要考试的。在国立复旦小学，我考了个“试读”，我没去。最后上了离家稍远在华山路边的私立改进小学。校门上的大横匾是汤恩伯（当时并不知他是旧上海市的市长）题写的校名。学校虽小，但很漂亮。一进校门，就是搭着花架的走廊，穿过廊子就看见

一个带有小花园的二层小洋楼。一楼是幼儿班与一、二、三年级，其它年级在二层。花园就是学生做操和游戏的地方，边上还有一个小喷水池，池中有假山石。与学校后门相连的是一个小礼堂，每周一有周课，各班排队站立，教务主任会在台上训话。旁边有一架风琴，上音乐课也在那里。不久，上海解放，学校的老师几乎全换了。新校长贺珍、教务主任张冲，年龄都在四十上下，都是南下干部。其他老师大都很年轻、未婚。我们这批“小鬼”（当时对孩子的爱称）私下里给我们喜爱的老师乱点“鸳鸯”、瞎配对：班主任曹前老师与教语文的许文仙老师；长得很帅气的教自然的陈列老师与爱跳舞唱歌的孙菊仙老师……结果全配错了。那时，老师们为我们组织的活动真多，如捐献“一两米”救灾区，捐“破铜烂铁”支持国家建设，少先队入队仪式，举队旗入场仪式，演讲比赛，合唱比赛，跳集体舞，扭秧歌，打腰鼓……我印象最深的是“去苏联旅行”的墙报活动。墙上挂着前苏联地图，每星期用小红旗标出到达苏联的城市，还贴出我们从那里发回祖国的“信件”、照片和小礼物，描述在那里观光访问的种种趣闻。为这些“信件”，我们要在课外寻找不少资料，这活动持续很长时间，我们乐此不疲，兴趣盎然，学到了不少知识。

我那时学习成绩不错，每学期总得第二名，第一名总是班长孙南礼，她在班上年龄最大，尤其是劳作课的作业，总是她做得最好，我的动手能力差，总是追不上她；第三名总是鱼梦玲，她也总追不上我。我和她年龄、体型、爱好都相仿，是好朋友，一起演出朝鲜族舞蹈“道拉吉”（译音）。演出时穿的白裙子是教体育的吴老师用幼儿班的小圆顶帐改做的。坐在同课桌的男生叫黄金生，他与奶奶相依为命，长得瘦小，但好动、调皮，上课总是要做小动作，不时从课桌里拿出他的玻璃球、小刀、漆包线、小电动机等“宝贝”玩，上课我怕老师发现，有时就劝阻他，他倒不领情。我的胳膊一超过“三八线”，他就猛一掀课桌板撞我胳膊。还有一个男生叫汪绳武，长得虎头虎脑，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，班里搞清洁卫生或什么劳动，他特别积极。女同学章安宜，说话细声细气，胆子很小；王菊卿却快人快语，胆子也大，从不怕男生，我和她们很要好，但小学毕业后，我们各分东西了。章安宜随父母去了北京，我工作后曾回上海去找过王菊卿，但已搬家了。如今，上了年纪，追忆儿时，越发感到亲切，我们还能相逢吗？

风华少年



1952年考入初中

离江苏路不远的愚园路口有座闻名的中西女中，原来是贵族女子中学，宋氏三姐妹曾在此上过学。校园很大，有一大片绿草地，许多树木和楼房，大礼堂犹如剧院，有两层，还有回廊，礼堂里高高的窗户上镶嵌着彩色玻璃，很华丽。1952年我小学毕业时，它改名为“市立第三女子中学”，吸引了数以千计的，尤其是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子女。我有幸在这座学校上了三年初中。我记得教学主楼的六楼是一间间的钢琴房，每月学钢琴费是35元，学小提琴的费用是3元，而每月在校的午餐费才3.8元。因此像我这样普通家庭出身的只能望洋兴叹。但我们班的杨镜钏、毛节芳、左坤三位同学去上了钢琴课，他们毕业后都考上了音乐学院附中，其中杨镜钏后来在中央交响乐团成为一名出色的女钢琴家，我曾在

电视上看到过她演奏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我的班(六班)当时命名为卓娅班和卓娅中队，一班是“古丽娅班”，她们都是我们那年代崇拜的苏联女英雄。我们班的班主任叫董蔚玲，刚从我校高三年级毕业留校；中队辅导员是新考进校的高一班学生，她们就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，和蔼可亲，工作积极认真，我们都很喜欢和尊敬她们。

班长方莹妹，在班中年龄偏大，当过童工，小姆指有当年留下的残疾，学习基础较差，但很用功，工作认真负责，是“心红根正”的好苗子。张雪玲家庭贫困，父亲失业，她家离学校很远，开始学校没有让她住校，我就约她在我家住宿，每天同出同回，成了最要好的朋友，她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。吕孝濬也是我的好朋友，聪明，学习成绩好，还有很好的口才，她后来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。

我当时的美术成绩在班上不如陈洁心同学那样突
初中毕业





出，教美术的李
松老师对我的印象也不

是很深。在初三临近毕业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戴铁郎老师，我才知道杭州有个美院附中。他给我拿来了附中上海考区的报名表，鼓励我去应试。我临时抱佛脚，突击画起了素描，并临摹了一些我喜爱的儿童插图。上海考区报名就有2000多人，初试留下80名，再经过文化课考试和面试，最后只录取了20名。以后才知道，我的素描考得一般，但创作竟考了5分，当场发挥较好，构思不入俗套；文化课

也考得不错，又照顾了女生比例，我就幸运地被录取了。

临近毕业时，学校少先队组织慰问志愿军、做慰问袋的活动。我将我的画和我写的诗（原诗已忘了）放进了慰问袋。不久，收到了不少解放军和志愿军寄来的信件，我很纳闷。后来才知在《解放日报》有关少先队员慰问志愿军的报道中，提及了我的这首诗。开始我还回了几封，后来因为当时忙着毕业考试和报考美院附中、赴杭州报到等，我就忙得顾不上了……



40年后回母校，在教学主楼前。

艺术摇篮

当时附中的全称是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，虽然在我人生道路上它只是四年的时间，然而对我确有着终生的影响。至今，每每回到杭州，我总有“回家”的亲切感。

1955年，我只身来到杭州。三轮车夫把我拉到西湖边，指着对岸的孤山说：“杭州是天堂，西湖是天堂的天堂，你的学校在孤山，它可算是天堂的天堂的天堂了！”我听了真有点飘飘欲仙了。

美院的校舍在孤山平湖秋月的对面(现今的浙江省博物馆)，附中校舍在它右面，是孤山下的一座古式建筑，门前有一对石狮，原名叫“朱公祠”，听说是为纪念南宋大思想家、理学家朱熹而建的，但不知道建于哪个朝代。它背靠孤山，面对西湖，右边是西泠印社，左边有“徐锡麟烈士墓”和耸立在孤山顶的“青白山居”。校舍是一座环境幽雅别致的江南园林，有亭台楼阁、天井、长廊、花园、池塘。沿墙长廊上挂着一排玻璃镜框，陈列着学生们的佳作。办公室、教室设在楼下；阁楼上住着马玉如、陈翔龙、吕洪仁、何永定、严幼俊等青年教师。宿舍、食堂都在大学部旁边的苏白二公祠内，离校舍有一



与杨家珏在湖心亭遇见大学部青年教师
后排从右至左：周昌谷、殷光宇、宋忠元，
从左至右：卢琪辉、方增先。

站的距离。当时年青，一天要走好几个来回也不觉得什么，记得上完晚自修，我们精神头还十足，三五成群，拿着脸盆、饭盒、水罐，边敲打边唱着印度电影《拉兹之歌》的插曲《到处流浪》，走到平湖秋月眺望那夜幕下的西湖明月，有时还乘兴跳起了集体舞……如今，“朱公祠”校舍、大学部的校舍都已荡然无存，浓浓的怀旧情绪，不免涌上心头，回想那种纯真、烂漫的日子，依然那么甜美……

刚进附中，就赶上了“肃反”运动。大学部包括附中都停课投入运动。当时，才15岁还带着红领巾的我，还是头一次面对这样一场政治运动。听说大学部的一排平房里关了一批“反革命”，就特别好